

法兰西历史的误读

郭 华 榕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法国历史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尽管近年来法国史学研究呈现出“萧条”和“平淡”的状况,但在档案的开放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方面仍取得了不少进步和成就。我国学术界对法国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若干误读至今还在束缚着我们,比如左翼史学遭到了“个人化”而忽视其对大革命的批评、对于档案与社会调查等的认识不足、未能汲取国际学术界已经澄清的史实的成果等等。我国学术界应不断加强对法国史的研究,多利用法国原始档案和调查资料,加强原文名著的翻译,努力避免对法国历史的误读。

关键词:法国史学;研究趋势;中国学术界;误读

中图分类号:K5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2-0117-09

误读法兰西,经常发生。巴黎是专门供人消遣的花都吗?那里街头通常开着鲜花,与此同时巴黎人却在辛勤地劳动。请看一看那当菲尔-罗什罗附近的达凯尔街上(Rue Daguerre),卖菜卖花卖鱼卖肉的中老年妇女的紧张工作。还有那地铁里上下班时的人山人海、国家图书馆开门之前排队等候的人群……巴黎街头大家穿着时装吗?不对,普通人穿着五花八门的普通的衣服。电视里经常播放着 T 型台上的时装表演,但是它与民间的普及历来相距甚远。就此而言,整个法兰西与巴黎相同。法国人都很友好、彬彬有礼吗?不是所有的人,笔者曾经亲身体验。1988 年秋,笔者以布尔戈尼大学教授身份在第戎市瓦内里街(Rue Vannerie)租房时,遇到了种族主义的对待,女房东竟然宣称:“我不愿意租给这样的外国人(非欧洲人)!”“不租给亚洲人!”我的同事法国教授为此感到气愤,直接向共和国检察官告发,检察官表示将打电话教育该女士。据那时当地新闻报道,第戎市中心的个别咖啡馆公然拒绝接待北非顾客。从那些流行化、旅游化、电视里某些盲目的乐滋滋的赞扬当中,我们看到了简单化—绝对

化—神化,其实背后或许另有一类事物、人物和想法,另有一些追逐的利益……

误读法国历史,也经常发生。我们的历史学,就误读问题而言,也难于例外。中国人与欧洲人,是否了解对方?如果将此做一比较,我们中国人对于欧洲的了解显然较多,不论政治、文化、历史和语言。近代欧洲比较发达,中国人了解欧洲较多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主动和欧洲交往,学习他们比较先进的东西。近代欧洲人来到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和痛苦的回忆。与此同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的确较少。记得 1981—1982 年,笔者在巴黎的黎世留街(Rue Richelieu)的一家旅行社的橱窗内,经常见到关于中国的介绍:中国女性的模型仍是缠着小足,头带越南式的尖顶遮阳斗笠……此外,中国的文学名著翻译成法文者甚少。

与有关世界各大地区的研究相比较,中国学术界对于法国和欧洲的历史已有若干研究,学术专著和论文正在陆续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成绩斐然。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教学科研没有不足之处吗?对于法国的历史没有误读吗?实际状况如

收稿日期:2009-12-18

作者简介:郭华榕(1934—),男,福建长汀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 请允许笔者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一孔之见, 难免偏颇, 恳请赐教。

一 法国史学研究的现状

(一) 史学研究的“萧条”和“平淡”

近年来法国国际史学中, 过去的各大派别, 现在或默默无闻, 或逐渐销声匿迹, 如同历史上曾经的学派, 它们有产生、积极活动、收缩、消失的“生命过程”。近年来, 在法国史学界, 看不见某个比较突出的学派。“目前, 到处平淡无奇”。若干学派的领头人物陆续地离开了人世: 布洛克(Marc Bloch, 1944)^①、费弗尔(Lucien Febvre, 1956)、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 1959)、埃马尔(Maurice Aymard, 1964)、索布尔(Albert Soboul, 1982)、阿里叶斯(Philippe Ariès, 1984)、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86)、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 1988)、里舍(Denis Richet, 1989)、穆尼耶(Roland Mousnier, 1993)、迪比(Georges Duby, 1996)、孚雷(François Furet, 1997)、贝达里达(François Bedarida, 2001)、硕纽(Pierre Chaunu, 2009)等等。

尚在人世的著名学者, 如勒戈弗(Jacques Le Goff, 1924年生)、阿居龙(Maurice Agulhon, 1926年生)、勒卢瓦-拉迪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 1929年生)、普勒西(Alain Plessis, 1932年生)、热拉尔(Alice Gérard, 1932年生)、伏维尔(Michel Vovelle, 1934年生)等。这些70—80岁的学者已经少进档案馆, 少出专著, 而主要为他人著作写序或评论、致开幕词等。作为一代历史学家, 由于自然的、人生的规律, 正在完成一代人的使命, 而后进入历史的深处。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史学专著和若干治史的思想。同时, 我们看到, 法国史学研究中或多或少的“萧条”。例如, 1987年, 奥里(Ory)的政治思想史出版之后, 至今未见新的重要著作; 1997年, 卡庞蒂耶等(Carpentier et Le Brun)的法国史问世之后, 也是如此; 1990年塞甘(Philippe Séguin)和1997年曼格(Alain Ming)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专著出版之后, 也是如此……

这一种“平淡无奇”的状况, 至今仍在延续。或许新的学派还在萌芽待发, 还在聚集力量, 有待将来的兴起? 或许学术海洋上风平浪静之后, 即将来到的是暴风骤雨? 我们正努力观察, 拭目以待。

(二) 档案的陆续开放

档案的开放, 法国与意大利等国基本相同。法

国的历史档案, 通常分为两类: 一是公共档案, 符合规定的研究者办理普通手续后, 可以查阅; 二是私人档案, 分别收藏于公共档案馆或私人收藏处, 查阅之前必须获得有关家族“领头人”的同意, 例如波那巴家族的私人档案等。

1. 公共档案

一般又分为两种: 国家档案与地方档案。

(1) 国家档案。如法国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France)、法国外交部档案馆(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France)。就笔者关注的范围而言, 还应加上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国家档案馆, 如梵蒂冈秘密档案馆(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圣廷枢机会议档案馆(Archivio della Sacra Congregazione)、罗马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 di Roma)、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帕尔马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 di Parma)、卡塔尼亚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 di Catania)……

(2) 地方档案馆。如巴黎警察局档案馆(Archives de la Police de Paris)、科多尔档案馆(Archives de la Côte-d'Or)……

上述档案馆的档案, 正在陆续开放。档案馆的服务态度颇不相同, 但是经过种种手续后, 读者可以查阅到研究者所希望的内容。

(3) 另有政治党派自己的档案。如法国共产党的档案。从2005年7月1日起, 法国共产党已“开放1921—1994年的档案”。它全长约800米, 收藏于“塞纳-圣德尼档案馆”(Archives de Seine-Saint-Denis), 其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内反对派的有关档案。研究马尔蒂(André Marty)、勒构尔(Auguste Lecœur)、蒂勇(Charles Tillon)等问题的学者, 有可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人们指出, 下述档案未曾公布: 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有关档案、法共与“兄弟”国家的有关档案、法共与总工会(CGT)等群众组织的有关档案^②。

2. 私人档案

这里收藏着“不具有国家意义的、私人性质的档案”, 而实际上私人的日记、通信、回忆录、洗礼等宗教文献完全可能密切地与国家大事相关联。部分著名历史人物和家族的私人档案委托国家档案馆或地方档案馆代为管理。如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Eugénie)及其儿子的私人档案, 威斯特法利亚国王

(1784—1860)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及其后代的私人档案,博尔格斯亲王夫人波丽娜(Pauline Bonaparte)的私人档案,莫尔尼公爵(duc de Morny)的私人档案,等等。

(三)史学研究的新特点:研究的视野比较宽阔

研究的课题,不时超出我们史学习惯的范围,例如人体史、建筑技术史、宫廷中的私人关系、婚姻史、家族史(家谱)等等。

1. 历史人物重新受到关注。如黎世留(Riche-lieu)、路易十四(Louis XIV)等,若干专家正在新的水平上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治国政策、治国能力的研究。如伊尔德什梅尔的《黎世留,关于国家的若干思想》^[1]、《黎世留》^[2],里沙尔的《伟大世纪的太阳,路易十四及其统治》^[3],佩蒂菲斯的《路易十四》^[4],等等。近年来有关路易十四研究的情况,笔者曾发表专文详细介绍^[5]。

2. 历史辞书的不断出现。如卡拉的《政治思想辞典》^[6]、巴卢什等的《公仆,法国公务人员的政治史》^[7]、若利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的词汇与地理》^[8]、迪克勒尔的《共和国批判辞典》^[9]、阿马尔维的《法兰西的与讲法语的史学家生平辞典》^[10]、布腊硕的《关于第二帝国回忆录的批判》^[11]、特鲁松的《卢梭辞典》^[12]。

3. 人体的研究。如卡罗利的《太阳王的身体》^[13]。另外,也有若干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人体研究的专著和论文。

4. 流行的批判。弗洛伊德的著作在世界上已经流行了许多年,不少人趋之若鹜、深信不疑。但是,近年来,许多专家(包括研究历史者)在进行反思和考察,他们甚至联合起来对于这种流行现象进行分析与批判。2005年,法国出版一册新书《心理分析的黑书》,作者为欧美40位有关专家,他们宣称,弗洛伊德是“骗子”,他搞的是“伪科学”……对此,笔者无力作出判断,但是至少不必将弗洛伊德奉若神明。历史上,流行的东西,通常会流来,也一定会流走,会带来好的影响,也会留下坏的后果。法国历史反复告诫我们:对于流行的东西,需要了解,但是不必迷信。就此而言,历史科学也完全相同。

我们必须认清有关法国史学目前的水平及其不足,必须自己进行认真研究,努力探索和不断前进。

二 我国学术界对法国历史的误读

(一)对左翼史学的误读

1. 左翼史学的“个人化”

我国误读法国历史的例子之一,就是左翼史学的“个人化”。我国历来比较重视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曾出版若干译著和著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和文章。但是,每当提及“法国的左翼史学”时,便几乎异口同声地举出马迪耶(马迪厄,Albert Mathiez)及其《法国革命史》作为唯一的代表,指出马迪耶如何、如何说……马迪耶如何肯定与颂扬罗伯斯比尔,如何谴责丹东……

进一步,产生严重的误解,罗伯斯比尔成了大革命的唯一英雄。他横空出世,至高无上,控制救国委员会、国民公会以及军事力量和民众心态。

反过来,罗伯斯比尔既然是唯一的领导人物,那么反对与“反对”他的人,全部是犯罪嫌疑人、敌人、坏蛋……

反过来的进一步,由于竭力推崇罗伯斯比尔,马迪耶便牢靠地成了“左翼史学”的唯一的代表者。

于是,法国大革命史学中的“左翼史学”遭到了“个人化”,这是从肯定经颂扬至神化的演变,而神化也就是简单化,后果在于促使读者头脑的简单化。

如何判断“左翼”、“左翼史学”?标准是什么?

不是我们个人的随意选择,而是每个时代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的区分、人的群体冲突的界线,它们将决定史学家心中的选择。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法兰西的主要任务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取代封建主义。方式:政治上进行革命、改革,达到君主立宪制、帝制、共和制;经济上进行工业革命……米拉波、布里索、丹东、罗伯斯比尔、巴腊斯、拿破仑、路易-菲利普、拉马丁、拿破仑三世……皆属于上升的资本主义的营垒。无疑从原则上看来,共和制确实比君主制(立宪、帝国)优越。

梯也尔肯定大革命,讴歌拿破仑(过头了),当时他应属于中左翼,他撰写了《法国大革命》、《执政府与帝国史》两部名著……他相对保守,但是仍可归入共和派的行列,他曾领导共和国;晚年,在他领导下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外,后来若勒斯因为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当人们讲到“左翼史学”时,几乎不提此人对于大革命史研究的贡献。

另一个问题是,在大力推崇马迪耶的同时,人们有意无意、程度不同地忽略了“左翼史学”的绝大部分的史学家及其有关名著。如:米涅(Mignet)《法

国大革命史》，梯也尔(Thiers)《法国大革命》、《执政政府与帝国史》，米什勒(Michelet)《法国大革命史》，拉马丁(Lamartine)《吉伦特派史》，路易·布朗(Louis Blanc)《法国革命史》，若勒斯(Jaurès)《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奥拉尔(Aulard)《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勒费弗尔(Lefebvre)《法国大革命》，索布尔(Soboul)《法国大革命》。这些史学家有着不同的长处与缺点，也有着不同的功劳……这些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几代史学家，竟然遭到一定程度的忽视，甚至被迫游离于“左翼史学”之外，而让马迪耶独自守着“左翼史学的庙堂”。

2. 忽视左翼史学对于大革命的批评

著述与文献充分表明：几乎每一个“左翼史学家”都对大革命提出了批评，只是程度不一，各人心中的英雄不同。概括起来，他们一致认为：大革命有缺点，完全可以批评，不应将它神化。对此，过去我们经常容易忽视。有关重要的批评，部分摘录如下。

米涅指出：“在胜利的时刻，如果人们不滥用权力，那是少见的。要平息人民的情绪，重要的是制止这种对于权力的滥用，使人民在要求取消特权的同时，不要将特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1792年初，大屠杀时的4个监狱中，“3天之内，一个由公社领导的约300人的行刑队，将囚犯全部杀死。这帮人恣意杀人，而神态自若。他们把神圣的法律制裁变成了一场屠杀……他们像是以杀人为职业”；“人们如果不全面了解派别的狂热有什么过错，不知道恐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苦难，就会感到奇怪，这么严重、持久的罪行是怎样被策划、得到执行和容忍的”；“罗伯斯比尔有实行暴政的一些特性”，山岳派属于“狂热信仰”，罗伯斯比尔有一个“狂热学派的支持”，“丹东是一个政治领袖。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是真正的狂热派，罗伯斯比尔野心较大，马拉则更为狂妄”；“救国委员会实行了最残酷的大举杀戮……救国委员会的政策是报复、恐怖与自我保护”，国民公会是“独裁政权”，圣茹斯特主张建立“独裁政权”，“于是，这个可怕的强力政权就此建立起来。它首先吞噬了山岳派的敌人，继而吞噬了山岳派与公社，最后吞噬了它自身。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的名义下支配一切，国民公会成了它的工具”，“埃贝尔这一派在《杜舍老爹报》上经常散布淫秽的下流卑鄙的言论，嘲弄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14]51、148-149、158、177、212、214、215、218。

梯也尔在书中谴责革命党人的过激行为，直言

不讳地反对恐怖统治，明确“否定恐怖统治”。

米什勒对于山岳派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批评，将罗伯斯比尔形容为“猫”，马拉为“癞蛤蟆”；1794年7月发生热月政变时，“巴黎又重新变得欢欣鼓舞。虽然存在饥荒……真的，罗亚尔宫到处是人，剧场到处满座”^[15]382、96。他还认为，“马拉是模拟卢梭的猴子，罗伯斯比尔是一个书呆子”，“九月大屠杀是民族荣誉的污点”，“谁腐蚀了革命？马拉与罗伯斯比尔”^[16]328^[17]327。

奥拉尔抨击山岳派政权对于吉伦特派的迫害，指出：“审讯始于1793年10月24日，被告21人，如布里索、维尼奥……(审判者)难于将如此不同的人归结为同一个阴谋，因此检察长仅仅重复模糊不清的互相矛盾的控告……审问与供词无法确定被告们的任何共同的罪行……证人主要表达了山岳派对于吉伦特派的仇恨。”认为，丹东是“人民的化身”，“恐怖使革命的完成推迟了50年”。1794年6月11日—7月27日热月政变，法国“出现了极端恐怖”，巴黎每天处决40、50、60个“犯人”，奥拉尔对此严加谴责，认为这是一个“屠宰场”。热月政变时，罗伯斯比尔被押赴断头台，“一路上，人们兴奋地鼓掌，高呼打到暴君！共和国万岁！以及各种可能的辱骂”^[18]539、604^[19]604。

马迪耶认为，1793年6—7月以前，“只有王党是犯罪嫌疑人；现在，原来是革命派的重要集团也属于通敌之例。犯罪嫌疑人的范围逐渐扩大。要辨别公民之好坏日见困难”，“革命派不久便只是一个狂热、警惕而有活力的少数派……只有它才需要专政和暴力”，“革命政府变成了(山岳派的)一派专政”，1794年4月，“以前喜欢争论的国民公会，现在对于两委员会的一切建议，只有默许……代表们噤若寒蝉”，“过分的杀戮刺激了普通人的良心……人民厌恶流血了”^[20]160、227、319、360—361。

勒费弗尔指出：1793年9月17日，“发布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其规定有很大的弹性，因而那些革命委员会几乎能够为所欲为了”；1793年，“破除基督教信仰运动于11月猛烈开展，触发了一场出人意外的社会动荡”；1793—1794年恐怖统治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和拥护者头脑发热”，国民公会派往各地的“特派代表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地主持恐怖统治……镇压扩大化”，“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恐惧与仇恨永远不能忘怀，并将它们传给了自己的

后代”；1794年7月，“绝大多数法国人（对当时山岳派控制的革命）持反对态度……国民公会代表们胆战心惊，朝不保夕”；处决罗伯斯比尔时，“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革命政府受到致命的打击，因而感到满意：他们确实没有看错”^[21]350、359、390、393、425、429。

索布尔认为：“山岳党人本身来自资产阶级”，山岳派专政“是专政性的中央集权”，“政府……终于因为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而覆亡”；1794年3—4月，处决埃贝尔派、硕美特派、丹东派，这些都是“惨剧”^[22]212、279、280、296。

上述批评可以概括成为下述内容：恐怖时期是少数人掌权，罗伯斯比尔等领导人有着狂热的思想，他们曾滥用权力，出现了恣意杀人……引起了大多数民众的不满。事实充分表明，左翼史学家们原则上理智地看待法国大革命，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二）对于档案、社会调查等的认识不足

档案、社会调查、笔记、日记、私人信函、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原本具有价值，但是在中国学者关于法国历史的研究中，它们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产生如此状况的原因，既有客观条件的问题，也有研究者自身的认识问题。

1. 档案文献

此处所指为研究者本人已在法国，懂法语也有可能接触有关档案的情况下，未能对档案文献给予足够的重视。坊间的有关书刊经常可见若干“落后痕迹”，即国际史学已经查明的真相、解决的难题、证明的事实、揭穿的谎言，还在我们眼前反复出现。

布罗代尔在他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内指出：“对于大量的原始档案，如果没有确切的了解，无法写出一部地中海的历史。”“文献资料……是毋庸置疑的资源、最丰富的历史金矿”^[23]5。的确如此，笔者曾经有幸使用若干档案馆的档案（如法国的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案馆、科多尔省档案馆，梵蒂冈的秘密档案馆、教廷枢机会议档案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等），弄清了探讨中所遇到的部分难题，获益匪浅。

例如，由于对档案缺乏研究（尤其至今未曾公开或尚未公布者），我们对于共和运动或民族运动的了解明显不够。勒德律-罗兰、马志尼与科苏特等人曾经成立“被放逐者国际”（Internationale des proscrits），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另外，科苏特曾宣布匈

牙利为独立国家，但是未讲它是否为一个共和国……

2.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一般而论是调查者亲眼所见、亲身体会之后记录的社会实况。调查无疑受到时代、阶级、党派、家庭、个人爱好、利益、语言等等的限制，但是他们的调查报告、游记、信函等毕竟是一种记载，具有不尽相同的价值。恩格斯的《从巴黎到伯尔尼》就是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记录。可惜，过去人们极少提及恩格斯的这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此时，笔者记起的有关著作如下。沙尔丹（1643—1713）的《波斯游记》^[24]，是该旅行家多次游历波斯、东印度的文字记录。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旅行记》（*Voyage de Montesquieu*，1894—1896），是关于18世纪前期奥地利、意大利、德意志、荷兰、英国的记载。沃尔内（Volney）的《埃及和叙利亚游记》（*Voyage en Egypte et en Syrie*，1787），我们从中能够了解一个法国人、欧洲人的心态。斯达尔夫人（Staël）的《十年流亡生活》（*Dix années d'exil*，1821），记载了她对于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和瑞典的个人印象。海涅（Hiene）的《哈尔茨山游记》，是他1824年9月从哥廷根至哈尔茨山历时两个月徒步旅行后的作品。此外，他还有《从慕尼黑到热那亚》、《英国片断》等等作品。

3. 私人通信

私人通信经常可能提供有价值的生动的史料，尤其关于文化生活与社会状况。例如：曼特依夫人等的《尊重与温情，私人通信》^[25]，介绍了路易十四以及法国的宫廷。沙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致雷卡米叶夫人（Mme de Recamier）的一批信函，见《九泉之下的回忆》下册等处。巴尔扎克-汉斯卡《致外国女性的信函》^[26]，介绍了他们俩人的情爱交流，以及19世纪前期法国文人的生活与欧洲人的感情历史。乔治·桑-缪塞的《爱情书简》^[27]，通过他们俩人的恋爱历史，可以了解法国文人的精神生活。乔治·桑-福楼拜的《信函》^[28]，介绍了19世纪法国文人的友好交往与相互支持，以及若干社会政治动态。恩格斯于1856年和Mary Burns一起游历爱尔兰，1869年和Lyzzi Burns一同游历爱尔兰之后，将他的印象写入了与马克思等人的通信。

4. 回忆录

马克·布洛克指出：“无疑，历史研究认定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29]49} 可举的例子很多。例如：沙多布里昂(Chteaubriand)的《九泉之下的回忆》(*Mémoires d'outre-tombe*)，涉及法兰西、意大利、英国、美洲、中东……曼特依夫人(Mme de Maitenon)的《回忆录》(*Mémoires*)，涉及17世纪后期与18世纪前期的法兰西宫廷生活与其他人和事。赫尔岑(Герцен)的《往世与沉思》(*Былое и думы*)，记载了他的流放生活。他到过伏尔加河流域、喀赞，曾在邮局的桌子上睡觉，宪兵一直陪伴着他……在佩尔姆城，省长请他参加女儿的婚礼，介绍他和遭到流放的波兰人认识……次日，宪兵离开佩尔姆，返回圣彼得堡。赫尔岑在当地自由活动，只是于每周六早上10时，由省长点一次名而已，看看有关人员是否还在当地。

5. 日记

例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游历英格兰与爱尔兰日记》；阿波尼伊的《从革命至政变》^[30]，此人于1826—1849年任奥地利驻法国使馆的随员。

(三)应该改正的硬伤

1. 应该澄清的历史事实

数百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的历史研究不断延续，也在陆续取得成绩，尤其是对于历史事实的查清与说明。了解国际史学的成就与进行国际史学交流，无疑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生活环境，对于过去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不能苛求。但是，一旦了解了新的成果，就应该汲取和改正，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法国历史甚至欧洲历史的研究与发展。下面的例子事关近百年、近数十年来已经澄清的史实。

(1)路易十四不曾讲过“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这句话。路易十四23岁时，1661年3月9日，马扎然去世，大臣们问道：“今后我们有事时，应该找谁？”路易十四回答：“找我!”¹⁰日，他宣布从此由自己治理国家，认为“国王是绝对的主人”，“必须独自作出决定”，“法出于我”，“永远不要首相”；1665年4月13日，他对高等法院“以非常的方式”表示独自治国的主张^{[31]965,967[32]208[33]96}。这些才是恰如其分的事实。路易十四不曾说过“朕即国家!”这一句话。

(2)启蒙运动并非始于孟德斯鸠。坊间书刊讲到启蒙运动时，通常只讲起自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经

百科全书派，延续至卢梭。实际上，启蒙运动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早期，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如贝尔(Bayle)《历史的与批判的词典》、梅利叶(Meslier)《遗书》、若利(Joly)《真正而重要的准则汇编》、茹里欧(Jurieu)《牧师致法国信徒的信函》等；中期，18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末，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波斯人信札》等、伏尔泰(Voltaire)《哲学通信》等、狄德罗(Diderot)等主编的《百科全书》、魁内(Quesnay)《经济表》、卢梭(Rousseau)《社会契约》等、莫雷利(Morelly)《自然法典》、马布利(Mably)《对自然秩序的疑问》等；晚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如孔多塞(Condorcet)《人类理性进步史的概述》、伏尔内(Volney)《废墟，或关于诸帝国的革命的沉思》、迪皮伊(Dupuis)《一切宗教的起源或全球的宗教》等，晚期的这几位启蒙思想家曾亲身参加法国大革命，并尝试将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变为现实。

(3)吉伦特派不是“联邦主义者”(fédéralistes)。这是处死吉伦特派的罪名，即策划阴谋、妄图分裂国家与反对革命。实际情况早已查明，事实并非如此。仅仅比佐(Buzot)一个人偶尔曾经表示倾向联邦制。马迪耶如此评论：“联邦主义……为人们所认为是吉伦特派所希望的。”索布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词典》指出：“这是亲山岳派历史编纂学搞出来的。”^{[34]437-438}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证明孔多塞(Condorcet)所撰写的宪法草案(即“吉伦特派宪法草案”)第一条强调“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35]38}。此外，即使赞成联邦制，也不应有死罪。瑞士、德意志帝国、尼德兰共和国、美国等曾经有过或至今仍是联邦制度。

(4)科尔黛(Corday)不是王党份子。1793年7月3日，科尔黛刺死了马拉。人们将科尔黛说成“王党份子”。实际上，她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她出身于外省的小贵族家庭，但是受到了卢梭、雷纳尔(Raynal)等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她反对1792年9月的屠杀，政治上接近吉伦特派，她自己曾明确表示：“我早在革命之前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早在1824年，米涅在他的著作里已经指出，科尔黛是一个共和派；1989年，索布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词典》内有关条目写明，她是一个共和派^{[14]203[34]292}。

(5)旺代(Vendée)事件不能简单地说是“反革命叛乱”。马迪耶书中的标题原为“旺代”，中译文变成了“旺代叛乱”^{[36]25[37]190}。既然先通过翻译定性

为“叛乱”，而后便应予以彻底否定。实际上，旺代事件开始时，1793年3月，法国西部若干省份发生骚动时，带头人多是老兵、盐贩、理发匠、车夫和医生，甚至革命政权的市长或镇长；4—6月，贵族与王党份子才逐渐成为领导人。对于旺代事件，不应该简单化地作出判断，参与“叛乱”的大多数为平民百姓，他们的确反对封建专制，也在原则上支持革命，但是因为远离战场而尚未经受外敌入侵与战乱，不理解征兵的急迫性，以及不满于地方官吏的某些行为。

(6)关于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等的误传。关于波拿巴家族，历来有许多传说。例如，传说拿破仑三世身边有一只受过训练的秃鹰，即拿破仑之鹰。无疑，这是可能的。与此同时，另有一个传说：始终有一只雄鹰在拿破仑三世的头顶上盘旋，这是因为他帽子内放了香肠，香肠腐烂发臭，招引老鹰，它因此不愿飞走……实际上，不可能。腐烂、发臭、流水……谁能每日忍受？散布传说者自己能够忍受？！

流传一种说法：欧仁妮皇后曾经肆无忌惮地宣称，1870年法国对普鲁士作战，“这是我的战争！”(C'est ma guerre!)对于这个传说的传播，梯也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卡约在他的《我的回忆录》^[36]一书中提及这个传说。皇后欧仁妮长寿，活了94岁，于1920年才辞世。1906年，她与著名外交家帕勒奥洛格(Paléologue)谈话时严正地声明：“啊！您听我说，我从来不曾讲过这些话。(这是我的战争!)”社会舆论认为，此事最早是由当时驻柏林大使勒祖尔(Lesourd)揭发出来的。欧仁妮接着说：“我曾向他询问此事，他在回信中说明我从未由口中说出那些引发战争的言辞。我保留着此信的原件。”^[38]¹³⁶法国著名的研究第二帝国史专家日拉尔明确指出：“欧仁妮不曾说‘这是我的战争!’。但是，她无疑企望一次政治上的胜利或一场胜利的战争，总之这应是(波拿巴)皇朝重铸辉煌的显著的成功。”^[39]⁴⁶⁴

关于勒博弗(Leboeuf)的传说。据说：普法战争之初，陆军大臣勒博弗元帅胆大包天，曾经狂妄自大地宣称：“我们的……最后一个士兵护腿套上的最后一棵纽扣都准备就绪了(扣好了)。”“我瞧不起普军!”后来证明勒博弗不曾发表如此言论^[40]¹⁹⁵。无疑，打仗是为了巩固帝国，法国官方过低估计了敌人，终于战败……对此不必争论。

(7)真假“巴黎公社战士墙”。数十年前，我们，

包括笔者在内，不曾确切了解1871年巴黎“公社战士墙”究竟在何处。1981年，经过巴黎实地考察后不难弄清：真正的“公社战士墙”(Mur des Fédérés)位于拉舍兹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之内的东南角围墙的内侧。对此，法国人历来未有歧见，他们甚至对中国人的争论表示惊讶。另外，墓地北部的围墙之外是甘必大林荫道(Avenue Gambetta)，在靠近围墙外侧的地方，有一个浮雕，这是莫洛-沃蒂耶(Paul Moreau-Vauthier)在巴黎公社失败多年之后的创作，名为“博爱万岁!”该浮雕不是“公社战士墙”。莫洛-沃蒂耶，生于1871年11月26日，他创作这个浮雕在于表明：恰逢枪杀时刻，博爱女神尽力进行阻止。作者具有广泛的博爱精神，同情斗争的受害者、失败者，反对残酷的国内冲突。

(8)对于德雷菲斯(Dreyfus)案件，当时社会上并非仅有两个派别。过去，通常介绍，当时法国一分为二，即支持德雷菲斯派(反对军方)，反对德雷菲斯派(支持军方)，社会如此、家庭也相同，双方互相冲突，此外，别无政治派别可言。事实上，当时存在第三种政治力量，它既支持德雷菲斯，也支持法国军方。此种政见也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代表人物如激进主义者克勒芒梭(Georges Clemenceau)、民族主义者佩玢(Charles Péguy)、激进主义者雷纳克(Joseph Reinach)等人。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

2. 关于翻译的问题

国内关于法国近代史的翻译著述中，可能遇到两个问题：能否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是否译自原文原著。

若干问题是属于如何译成中文更加贴切一类，如abbée译作修道院长或方丈等。另一类则是准确与否的问题。如“prêté aux Girondins de vouloir appliquer à la France la constitution des Etats-Unis.”过去曾译成：“吉伦特派所希望将美国宪法(联邦主义)应用于法国。”事实上，准确地说，应该译作：“人们认为吉伦特派希望将美国宪法应用于法国。”^[37]¹⁰⁷“人们认为”这几个字重要！吉伦特派不是联邦主义者。此外，顺便提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一词组中的“王位继承”的欧洲文字，如succesion(英、法)、sucesion(西)、наследство(俄)等，本意为“继承”之意，该词组应简单地译作“继承战争”。近代欧洲，多数争夺的是王位，因而可以译作“王位

继承战争”。但是,奥地利当时仅为一个“大公爵”,因而不能译作“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原文名著的翻译工作有待加强。法国的一批名著不是从法文直接译成中文出版,而是译自英、俄、日等文字。例如:梅利叶《遗书》,根据俄文本译出;魁内《经济著作选集》,译自日文,参照俄文;杜阁(Turgot)《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根据英文本翻译;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与审判》,译自俄文本;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根据英文本译出;普鲁东(Proudhon)《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第二篇,按英文翻译;布洛克《封建社会》,译自英文本。法国并非例外,其他国家的状况基本相同。例如,意大利但丁的《论世界帝国》,译自英文;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译自俄文……从无到有,译成中文,这是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更需要从原文译出,以便确切地了解作者的原意,减少误读的可能性。

(四)误读的原因与几点体会

1. 误读的原因

(1)解放前,过分偏重英语、日语。解放后,过度侧重俄语,又较多地接受了苏联文科的影响。其实,就学术,历史科学,国别史,例如法国史而言,掌握不同的外语(如法语)十分重要。

(2)改革开放以前,赞扬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不够重视甚至忽略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忽略了法国历史中改革与宽容的作用。

(3)对于法国的档案、社会调查、日记、私人信函等的认识不足,研究者有可能接触时,探索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4)经费、外语、翻译、地理距离和社会条件的不足,导致学术信息与研究人员的交流不够。此外,译音的标准化有时受到南方口音的影响。

(5)对于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了解不够全面,不明白它的宽阔范围(包括对于山岳派及其专

政的批评),不敢正视左翼史学家著作中的缺陷(例如对于人物评价的偏颇)。

2. 几点体会

笔者深深地认识到:首先,法国、欧洲的历史始终在不平衡地发展,它也是具体的和实际的。在欧洲,法国等少数国家曾经发生革命,北欧等国家则较多通过改革,促进社会的演变。此外,不同的时段,可能出现相同或相似的事件。例如,法国的“到民间去”思潮于1830年由共和派掀起,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出现于1873年末,晚了40余年。再如,最后的骑兵大血战,在西欧发生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中,而在东部欧洲迟至1920年才发生于俄国。法国大革命也充分展示了历史的不平衡性。对于共和制度的认识、对于以高度集权去应对内外危机的认识,就不可能立即做到万众一心、全民同步。此时,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应为关键。当战友对政策仅仅表示若干不同意见时,对他们进行残酷压制,必将导致革命营垒团结的破坏。须知,直至1879年初,参议院部分改选时,法国大多数农民才放弃对于皇帝和波拿巴主义的迷信,转而投票赞成共和制。

其次,历史是有限度的,法国历史也无法例外。我们研究历史时,如果神化法国历史,搞神化者实际上有可能神化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或神化了学术领域的权势地位。与此相反,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实事求是。恩格斯论及1848年6月起义的巴黎工人时,曾经指出:“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立,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41][21]}可见,并非越左越好,当然也不是对极左批判得越多越好。我们必须以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要求为依据,去研究法国史、欧洲史,得出自己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误读,争取不误读。

注释:

① Bloch 当中的“ch”应该发“k”音,因此译作“布洛克”。请见有关法语辞书或法汉词典。

② “Le Monde”, 2005-06-20.

参考文献:

- [1] Françoise Hildesheimer. *Richelieu une certaine idée de l'Etat* [M]. Paris, 1985.
[2] Françoise Hildesheimer. *Richelieu* [M]. Paris, 2004.

- [3]Richarddt. *Le Soleil du Grand Siècle* [M]. Paris,2000.
- [4]Petitfils. *Louis XIV et Son règne* [M]. Paris,2001.
- [5]郭华榕. 法国的路易十四研究[J]. 史学月刊,2005,(12).
- [6]D. Calas. *Dictionnaire de la pensée politique* [M]. Paris,1997.
- [7]M. Baruch et V. Duclert. *Serviteurs de l'Etat. 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M]. Paris,2000.
- [8]B. Joly. *Dictionnaire et géographie du Nationalisme français* [M]. Paris,1998.
- [9]V. Duclert et Chr. Prochasso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publique* [M]. Paris,2002.
- [10]Chr. Amalvi.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historiens français et francophones de Grégoire de Tours à Georges Duby* [M]. Paris,2004.
- [11]Chr. Bourachot.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mémoires sur le Second Empire* [M]. Paris,1994.
- [12]R. Trousson. *Dictionnair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M]. Paris,1997.
- [13]Michelle Carolly. *Le corps du Roi-Soleil* [M]. Paris,1999.
- [14]米涅. 法国大革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5]Roland Barthes. *Michelet par lui-même* [M]. Paris,1954.
- [16]古奇. 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17]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下册第三分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18]Alphonse Aulard.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rigines et développement de la démocratie et de la République* [M]. Paris,1901.
- [19]Louis Madelin. *La Révolution* [M]. Paris,1911.
- [20]Albert Mathiez. *La Révolution* [M]. t. 3. Paris,1978.
- [21]Georges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 Paris,1989. 7e édition.
- [22]索布尔. 法国大革命[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
- [23]布罗代尔.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4]Chardin Jean. *Voyage en Perse et aux Indes orientales*, 1686[M]. Amsterdam,1735.
- [25]Mme de Maintenon, Mme de Caylus et Mme de Dangeau. *L'estime et la tendresse. Correspondances intimes* [M]. Paris, 1998.
- [26]Balzac-Hanska. *Lettres à l'étrangère* [M]. Paris,1899,1906.
- [27]George Sand-Alfred de Musset. *Lettres d'amour* [M]. Paris,1985.
- [28]George Sand-Flaubert. *Correspondance* [M]. Paris,1981.
- [29]马克·布洛克. 为历史而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 [30]R. Apponyi. *De la Révolution au coup d'Etat*, 1848-1851[M]. Gèneve,1948.
- [31]Jean-Christian Petitfils. *Louis XIV* [M]. Paris,2001.
- [32]François Bluche. *Louis XV* [M]. Paris,1986.
- [33]伏尔泰. 路易十四时代[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34]Sous la direction d'Albert Soboul. *Diction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 Paris,1989.
- [35]Léon Duguit et Henry Monnier. *Les Constitutions et les principales loi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M]. Paris, 1932.
- [36]Joseph Caillaux. *Mes Mémoires, Ma jeunesse orgueilleuse*, 1863-1909[M]. t. 1. Paris,1940.
- [37]Albert Mathiez.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I* [M]. Paris,1924.
- [38]Maurice Paléologue. *Les Entretiens de l'impératrice Eugénie* [M]. Paris,1928.
- [39]Louis Girard. *Napoléon III* [M]. Paris,1986.
- [40]Paul Guériot, *Napoléon III* [M]. Paris,1980.
- [41]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